

【家庭与性别】

情感缓冲、中间人调节与形式民主化： 跨代同住家庭的代际关系协调机制

肖索未 关 聪

内容提要：通过对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家庭的案例研究，本文考察同住环境中代际关系的冲突与协调。研究发现，在跨代同住家庭中，代际分歧和矛盾难以避免；很多家庭采取不同方式缓和代际张力，协调代际关系，维护家庭的正常运作。本文概括了三种同住家庭代际关系协调机制：情感缓冲、中间人调节和形式民主化。情感缓冲指的是通过代际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包容等亲密情感缓解矛盾分歧引发的家庭权力之争；当特定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尚未建立或者濒临破裂时，家庭核心成员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节；更为和睦的代际关系往往在情感缓冲的基础上辅以民主协商的形式实现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不同家庭成员由此获得一定的尊重和发言权。

关键词：跨代同住；代际关系；协调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是中国家庭现代变迁的一个总体趋势（马春华等，2011；王跃生，2013），但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中，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并非罕事。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中已婚子女约有40%和父母同住（许琪，2013）。研究者指出，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受制于当代家庭的现实需要。由于制度性保障的不足和家庭养老传统的延续，一些老人对子女赡养存在“刚性”依赖，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或精神慰藉等各方面。子女也将赡养父母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与父母同住以便更好赡养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王跃生，2014；许琪，2013）。与此同时，子女需求也是年轻夫妇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老人与年轻夫妇同住，很多是出于帮助子女缓解经济压力、分担家务和照顾小孩，形成一些学者所说的“临时主干家庭”（刘汶蓉，2012；沈奕斐，2013；许琪，2013；姚俊，2012）。

跨代同住有助于亲子间的交流互动和互惠互助，但也增加了代际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比如，石翎（2012）对隔代照顾而形成的扩展家庭的研究中发现，家庭成员间性格、脾气、饮食与生活习惯、语言与行为

作者简介：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婚姻家庭、人口流动；关聪，北京市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家庭关系多元复杂,夫妻矛盾、婆媳矛盾或者岳婿矛盾、亲子矛盾都比较集中。沈奕斐(2013)对上海城市家庭的研究也显示,在跨代同住的家庭中,即使是好媳妇和好公婆之间还是会有矛盾,而这些矛盾几乎全是小事情上的分歧。

跨代同住家庭矛盾冲突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亲子间的“代沟”——由于时代更迭、环境变化、社会化进程出现中断或转型,导致代际之间在社会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的选择方面出现差异、隔阂及冲突(周怡,1994)。比如,很多老人参与协助抚养孙辈,由于年轻父母和老人在育儿观念上的差异,如何管教孩子容易成为跨代同住家庭矛盾的焦点(Goh & Kuczynski, 2010, 2012; 栾俪云, 2009)。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增加,尤其是亲子和夫妻双轴并存,也使得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多元,代际之间展开关于家庭地位、权威乃至亲密关系的微妙竞争(沈奕斐, 2013)。

家庭的代际矛盾与冲突并非新事。然而,在市场化时代,如何处理成员间的分歧和冲突却在家庭内部提出了更多挑战。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家庭需要高度依赖代际互助来应对市场化的压力,而代际间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分歧则更为显性化(刘汶蓉, 2016; 石金群, 2016)。其次,在市场改革前,在城市社会中,单位和居委会往往积极介入调解家庭矛盾。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家庭日趋“私人化”,这些由外部机构分担的调节途径逐渐消失(左际平、蒋永萍, 2010)。因此,家庭内部如何调节矛盾、协调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一些研究关注了代际间如何应对矛盾,维系关系以保障家庭稳定和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主要是从个体策略的角度切入进行分析。比如,有学者指出,在跨代同住的家庭中,老人往往通过让渡权力的方式来寻求与子辈的和睦相处(沈奕斐, 2013; 夏天, 2015)。与此同时,一些家庭成员也通过建立亲密关系来化解矛盾。比如,在代际合作育儿中,年轻的母亲努力经营与老人的关系,满足老人的代际关系期待,从而换取老人退出育儿话语权的争夺(肖索未, 2014)。张爱华(2015)在华北农村的研究也发现,中年婆婆们积极对儿子的小家庭进行经济、服务、感情层面的投入,营造亲密的婆媳关系来避免代际关系紧张。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个体家庭成员维系代际关系的努力,也指出了影响代际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情感与权力,对本研究有诸多启发。然而,家庭生活是一个多个成员共处的过程,个体策略往往受制于成员间互动的方式,而代际关系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家庭成员互动的结果。因此,对跨代同住家庭关系的深入理解需要一定程度上超越个体策略的视角,从家庭整体层面考察成员间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协调代际关系的具体机制。

本文通过对跨代同住家庭的案例研究,考察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维系与矛盾应对,分析提炼代际关系协调机制,进而探讨两代人和諧共处的可能途径。文章的分析主要基于10个生活在北京的城市家庭案例。北京的跨代同住比例与全国数据趋同,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刘岚等, 2014)。本研究涵盖了年轻夫妇与男方父母(或男方父母中的一人)、与女方父母(或女方父母中的一人)、与男女双方父母同时居住(一般是男女双方的母亲)三种情况。本文第二作者访谈了这10个家庭中的17名家庭成员,其中包括9位年轻妻子,4位丈夫和4位老人,了解受访者对于同住的经历和感受,尤其是他们对代际关系的看法以及应对矛盾分歧的方法。受访家庭中的年轻夫妇出生于1979年至1985年之间,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家庭年收入超过15万,在北京有至少一套房产。2人是北京本地人,其余都是“新北京人”——通过升学、工作留在了北京,基本全部实现了代际向上流动。受访家庭中的老人大部分为京外户籍,有退休金和没有退休金的各占50%。有2位老人因配偶去世选择和子女同住,其余老人则主要为了照料孙子女的需要搬来子女家。访谈家庭中有2户准备但尚未长期同住,其余8户都同住至少一年以上,最长的一户在接受

访谈时已同住8年,有2户分别因为孩子上幼儿园不再需要老人帮忙和矛盾难以化解而结束同住。^①

在受访家庭中,因为生活习惯、育儿方式甚至个性脾气等方面的差异,年轻夫妇与老人在家庭事务中的分歧时有发生,处理不善便容易引发矛盾甚至冲突。在同住初期,老人与成年子女之间一般都在小心翼翼地摸索,尽量保持友好,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基本相处方式一旦确定,在一定时间内会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发生“大事”时才有可能发生变化。总体而言,在受访家庭中,大部分老人认为这是子女的家,自己主要协助帮忙,因此在家庭事务上有更多的“放权”行为。家庭内部也往往采取多种方式应对代际分歧,缓和家庭矛盾,保障家庭事务顺利运作,并使家庭成员获得一定的归属感。

本文总结出跨代同住家庭中代际关系协调的三种机制:情感缓冲、中间人调节和形式民主化。情感缓冲是指通过家庭成员间的理解、信任、包容、体恤等情感关系缓解矛盾分歧引发的权力之争。中间人调节指的是家庭中的核心人物作为“中间人”促进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发展,调节他们的矛盾冲突。形式民主化则是指家庭成员通过一定的民主形式(比如家庭会议、集体决策等)进行协商,亲子两代都获得对家庭事务(以及家庭成员的个人事务)的一定发言权和决策权。

这三种代际关系调节机制都建立在家庭内部权力和情感平衡的基础之上,但作用方式和作用情境存在差异。从运作方式来看,形式民主化主要涉及家庭成员间权力关系的平衡,而情感缓冲和中间人调节主要通过情感纽带“缓和”和“消解”权力之争。情感缓冲与中间人调节的差别在于前者倚赖特定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而后者则借助于充当中间人的家庭成员与其他成员的良好关系。从作用情境来看,情感缓冲侧重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积累与矛盾应对。中间人调节主要发生在部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尚未建立或濒临破裂的情况下,往往涉及彼此之间难以弥合的观念分歧与情绪紧张。形式民主化则主要涉及家庭决策过程,尤其是重大家庭事务。三种机制在家庭生活中并存,但在不同家庭中的适用性有所差异差别。下文将分别展开论述。

二、情感缓冲

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代际关系中的情感化转向。随着城市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父母对子女的刚性经济需求减少,但对亲子间的沟通、信任 and 理解的诉求增加(Evans, 2010; 康岚, 2012; 王跃生, 2012;);而子女对父母也有较强的信任、关心和心理依赖(刘汶蓉, 2016; 钟晓慧、何式凝, 2014)。亲密情感成为个体在代际关系中的重要诉求,也有助于代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刘汶蓉, 2016; 钟晓慧、何式凝, 2014; 肖索未, 2014; 张爱华, 2015)。“情感缓冲”作为代际关系协调机制的核心在于家庭成员基于维系良好的情感关系而对代际矛盾采取“包容性应对”的方式。而良好的代际情感的建立则往往与代际家庭的权力格局与道德责任的履行密切相关。

(一)包容性应对

包容性应对,指的是当发生意见分歧甚至矛盾时,家庭成员往往能够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行为方式,对对方的行为给予理解和宽容,一定程度上放弃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争夺,从而搁置分歧、缓和矛盾。包容性应对与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相互了解、信任、依赖、关心的亲密情感密切相关。分歧和矛盾在

^①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双方更有可能采取包容性应对的方式。代际情感促进包容性应对、缓冲矛盾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家庭成员能够基于对对方的信任和理解而避免“恶意猜测”,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以维系代际关系为考量,在承认“代际差异”的基础上避免破坏性行为。

以静文家为例。静文33岁,大专毕业后一直在公司工作,月入过万,丈夫做仪表销售,两人在北京和丈夫老家各添置了一处房产。四年前,静文女儿出生,在企业做财务的婆婆当时52岁。为了帮忙照顾孙女,她申请提前退休来到北京,把尚未退休的老伴一人留在老家。

静文与婆婆相处融洽,但也难免意见分歧,主要都跟孩子有关。比如静文买了环保颜料,让孩子在纸上随便画。婆婆有洁癖,怕孩子弄脏,不时过去说两句。静文看见了就跟婆婆提建议,说孩子专心做一件事时不要打扰孩子。婆婆接受静文的建议,尽量忍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静文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比较大的一次分歧是孩子上幼儿园,静文想送私立幼儿园,丈夫和婆婆都不同意——家附近就有个公立园,“放着公立的1200元/月不上,非得上3000元/月的”。但静文认为,公立园的时间安排不好,不管饭,放学太早。她认真考察了周边的私立园后,选择了一家满意的。之后不厌其烦地跟家里人做思想工作,强调“宁愿穿20块钱的衣服,也得把钱投在孩子的教育上”。在她持续游说下,丈夫同意了。婆婆仍不太赞同,但也没有拦着。后来看到孩子学习效果不错,婆婆也就不说什么了。静文提到,一家人生活,争执难免,家里有个约定,不管什么事商量好了,过去了就过去了,不翻旧账。

在静文家,婆媳俩基本能够直接化解在家庭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分歧和矛盾。在发生意见分歧时双方能够进行直接沟通,分歧一时难以化解的情况下,也能够“忍耐”“迂回”,搁置分歧而非激化矛盾。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静文和婆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的亲密情感。按静文的说法是,两人之前接触不多有点生疏,同住之后反而亲近了不少。在婆婆看来,“儿媳妇就跟亲闺女一样”。基于这样的情感体验和认同,她们都愿意维系良好的代际关系和家庭氛围。静文明确表示:“你想啊,你跟婆婆不痛快了,你老公就该跟你不痛快了,这个家里就痛快不了了。”而婆婆也愿意为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而尽量包容,“希望孩子们过得挺好的、和和睦睦的就行。”

(二)权力格局、道德责任与代际情感的建立

良好的代际情感有助于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包容性应对”矛盾冲突,协调关系顺利发展,而情感关系是在日常互动中长期累积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代际情感的建立与代际间的工具性支持(经济互动和事务性互助)和代际伦理往往互相交融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产生于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事务上的相互支持,而情感体验和认同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开展和家庭关系的维系(张爱华,2015;Gazso & McDaniel,2015)。

从受访家庭来看,代际间情感关系呈现出一些特点,体现在对代际家庭“权力格局”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新的代际伦理和道德责任。以往研究指出,在当代三代同住的家庭中,出现了“亲子轴倒置”子代居于家庭中心位置的总体格局,而该格局在日常生活中不时地受到挑战(沈奕斐,2013;肖索未,2014;夏天,2015)。这种以子代为中心的格局在本研究中有所体现。受访的三代同住的家庭中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干家庭,而是以子女家庭为核心的扩展,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清晰分界,在家庭成员间又有相应的道德责任。在“情感缓冲”机制有效运作的家庭里,老人往往甘于“帮忙者”的位置,尽心尽力地为子女家庭提供各种支持;与此同时,认可这是“子女的家”,以子女意见为主。在子女一方,呈现出一种“孝而不顺”的状态,在成为家庭“权威”的同时,避免直接顶撞、体恤老人的需求、同时给予老人一定的家庭事务处置权,满足老人对“关心”和“尊重”的代际关系期待。

比如在静文家,婆婆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包揽所有家务,平时买菜也自己掏钱,因为“孩子们还要还房贷,手头不宽裕”。儿子买房,老两口资助了20万的首付。婆婆表示:“能帮就帮了,就这么一个孩子,不帮他等你死了钱也是给孩子,到时候人家还不念你好。”而家里的大事则一般静文夫妇商量,婆婆不怎么参与,她想得很明白,“家里的事听他们的呗,提意见他们也不一定采纳,毕竟是家是他们的”。

静文在家庭照料的细节都让婆婆做主。婆婆有洁癖,一天墩地好几回,静文觉得没必要但也不吭声。孩子出门穿什么衣服,一般也是婆婆说了算。静文和婆婆也挺“说得来”。婆婆年纪轻,爱时髦,穿衣打扮有讲究。静文经常从网上选衣服让婆婆挑,虽说是几十、一二百元的,婆婆倒也欢喜。有时候丈夫出差不在家,静文和婆婆一起喝啤酒聊天。一家人出去玩也都带着婆婆,喝咖啡、尝美食,婆婆也愿意尝试。

静文和婆婆“说得来”,既源于婆婆年轻爱时髦的契机,也是努力“经营”的结果,婆媳俩在家庭事务上通力协作、互相关心,营造出“一家人”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如果说静文家的代际情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兴趣相投和事务合作,那么悦华家的例子进一步凸显了道德责任在建立代际情感纽带中的重要性。

悦华,33岁,硕士毕业,从事传媒工作,年薪15万,丈夫做生意。婆婆63岁,没有收入,早年丧偶后就一直跟着儿子,悦华自结婚就和婆婆同住。三年前,悦华孩子出生,妈妈也搬来一起住帮忙照顾孩子。悦华妈61岁,高中毕业,每个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平时主要由悦华妈照顾家人的生活,“能帮忙的都帮忙干了”,婆婆则主要待在自己屋里,每天给家里墩一遍地。

悦华妈妈觉得女儿女婿“工作压力大挺辛苦的”,“不帮子女感觉过意不去”,一起住自己身体不舒服子女也可以照顾。她打趣说把退休后干家务当作锻炼身体。原则上,家里的大小决定她都交由女儿女婿自己商量,她不插手,但有时候她也会和女儿女婿意见相左,尤其是在教育孩子方面。比如,女儿主张不打孩子,而她则认为孩子特别不听话的时候就得打;再比如她觉得孩子三岁该学会数数了,女儿觉得没关系不着急教。这些问题大家讨论一下就过去,最后一般都听女儿的。悦华妈表示,“孩子们的家应该以他们为主,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只是辅助作用,帮助他们干活”。

两位老人在家中的角色不同,经济状况也不同,但在悦华看来,“婆婆和妈妈都是妈”,她尽力做到“一碗水端平”。她经常给老人买东西,比如换季衣服、适合老人的电子产品,每次都买双份,逢年过节也会给两个老人钱。平时去看电影、外出旅游都会带上一个娃两个妈,去哪儿看什么也参考老人的意见。悦华丈夫觉得跟两个老人一起住,虽然少了点自由,但能互相照顾,家里人多也热闹。照顾母亲义不容辞,而岳母的无私付出更让他充满“感激”。他虽然不善于言语表达,平时出差都会带小特产回来,让岳母和母亲先尝。平时老人身体不适,他也会第一时间去挂专家号,带老人去看病。

在这个案例中,老人与子女之间的互动并不依据“贡献”多少的工具性原则,而很大程度上确认子代家庭为中心的原则上依照代际间的道德责任来组织日常行为。老人依照个人的情况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而子女并没有把两位老人的付出作为衡量回报程度的标准,而是根据老人的需要,给予经济支持、生活照料、陪伴和关心,履行作为子女的义务,同时满足了老人的情感期待。

三、中间人调节

“情感缓冲”依赖于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包容、感激等情感来缓解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然而,在特定家庭成员间亲密情感缺失或破裂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其他家庭成员充当“中间人”来调节家庭成员

间的关系,从而使代际关系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中。中间人调节机制的作用方式主要有两种:冷却和黏合。冷却指的是家庭成员发生矛盾时,中间人有效介入,化解矛盾。而黏合则是指中间人促进其他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结的建立。中间人大多由年轻夫妇中与父母同住的一方扮演,能够充当称职的中间人的家庭成员需要依赖于良性运作的夫妻纽带与亲子纽带。

(一)冷却

“中间人调节”的一种常见方式是,当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难以化解时,由中间人出面处理和协调,防止了矛盾激化升级,使得家庭关系相对平稳。我们不妨看一下岚珊家。

岚珊,37岁,大专毕业后在企业做财务工作。丈夫是事业单位员工,儿子7岁。岚珊怀孕后期身体不适需要照顾,而自己父母年龄较大身体较差,于是婆婆从农村老家过来帮忙,一直到儿子上幼儿园。刚开始,岚珊非常不适应。她觉得婆婆总是“掺和”他们夫妻俩的事儿。比如,岚珊胎盘前置,月份大了在家待产。一次她准备从床上起来,向身边的丈夫伸出一只手,示意拉她一把。婆婆在边上突然说:“有什么好拉的,自己坐起来不就行了。”岚珊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丈夫在边上接话说:“肚子都这么大了,拉一把也是应该的。”顺手把岚珊拉了起来,解了僵局。

生完孩子,岚珊妈妈照顾了月子,之后由婆婆接班。婆婆到的当天大家一起吃饭,说起给孩子办独生子女证,婆婆高声回应:“办什么办独生子女证啊,以后还要生二胎啊。”岚珊丈夫说:“第一胎北京户口还没有落实,生什么二胎啊?”(孩子户口落在岚珊在外地的集体户口上)。婆婆说:“可以把孩子户口落在你(岚珊丈夫)姐姐那儿啊,不生二胎以后养老怎么办?”岚珊听后特别生气,就跟丈夫说:“我不生二胎,要生你跟别人生去,我不需要孩子给我养老。”岚珊丈夫接着说:“妈,你瞎说什么啊!”婆婆没有再吱声。

生活中类似的摩擦不断,岚珊过得很不愉快。孩子大概一岁的时候,岚珊把心里的委屈和想法集中地跟丈夫谈了一次,之后丈夫找自己母亲谈了一下。那次谈话之后婆婆渐渐不怎么发言了。

在岚珊家中,婆媳之间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观念差异,尤其是家庭性别观念。婆婆遵循传统的性别观念,在家包揽家务,不让公公沾一点活儿,认为女人干家务、照顾男人是天经地义。而岚珊则信奉相对平等的性别观,女性也应外面工作,经济独立,而家庭照料也该夫妻分担,相互照顾。然而,观念差异引发家庭冲突的核心则是围绕跨代同住家庭的“边界”的界定。岚珊的家庭概念是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婆婆只是帮手,而婆婆则将儿子的家庭当作自己家庭的延伸,因其婆婆身份而有一定的“权威”。因此,岚珊眼中的小家庭或“夫妻俩”的事儿,婆婆觉得自己有资格发言评论,甚至可以“要求”媳妇。因此,在差异化的家庭定位下,双方的观念冲突外显出来,一时难以化解。

在这些矛盾外显中,岚珊丈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一方面在双方“剑拔弩张”时及时介入,平息了冲突;另一方面也采取背后沟通的方式,去化解这些矛盾。虽然婆媳矛盾是以让老人“让步”,接纳年轻夫妇的家庭观,不干预收尾,但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靠岚珊丈夫作为中间人的调节,搁置婆媳双方的观念分歧,使家庭生活能够顺利运行。在受访家庭中,通过中间人进行沟通、缓和在维系跨代同住家庭的关系中甚为重要,即便在婆媳、翁婿之间关系良好的家庭里,很多时候仍需要中间人发挥作用,比如上文提到的悦华家,悦华对婆婆孝顺、关心,婆媳间几乎没有红过脸。婆婆性格比较孤僻,有什么事儿需要跟婆婆沟通都由悦华丈夫来完成。

(二)黏合

中间人调节的另一种方式是当配偶与自己父母的情感尚未建立时,中间人努力拉近彼此的关系,促成

父母与配偶情感纽带的形成,起到“黏合”家庭关系的作用,帮助双方的建立起情感关联。

以晓旭家为例。晓旭,35岁,大学毕业后在事业单位工作,丈夫是部队中层干部,家庭年收入20万元。从儿子一出生晓旭妈妈就从农村老家过来帮忙照顾,已经有8年了。妈妈脾气比较大,刚开始住跟女儿也磨合了一阵。第一年,为吃饭的事儿,晓旭丈夫和岳母闹过别扭。晓旭丈夫吃饭喜欢经常换换口味,下下馆子,有时候饭做好了,他也想出去吃。晓旭妈心里不舒坦,觉得女婿嫌弃又浪费。晓旭跟丈夫商量:“你如果不回来吃饭可以,但是你得先告诉妈一声”,同时安慰妈妈:“什么好吃的吃久了也会烦啊?您想一下,如果您喜欢吃什么东西,一下让您连续吃上几年,您愿意吗?”在她的劝慰下,母亲慢慢想开了。

晓旭妈经常腰酸背痛,常年贴膏药。晓旭跟妈妈打趣说:“你看你用的膏药加起来得有一筐了吧?都是你女婿给你弄的。”有时候晓旭妈过节回老家,住得时间一长,晓旭就敦促丈夫主动给岳母打电话请老人过来,或者直接开车去接。晓旭也会把丈夫的喜好告诉妈妈。比如,晓旭丈夫爱吃瓜子儿,晓旭妈就把南瓜子攒一块儿,炒好给女婿,晓旭丈夫特高兴。晓旭得意地说,“我觉得我老公和我妈是磨合出来了。我妈现在跟他的关系比我还好呢!”

晓旭家翁婿关系从紧张到和谐离不开晓旭的努力,和岚珊丈夫一样,晓旭发挥了“冷却”和协助沟通的作用。在母亲与丈夫彼此陌生尚不了解之时,因生活方式、习惯喜好等方面差异引发嫌隙,晓旭及时介入进行疏导。除此之外,晓旭积极地培育和“黏合”丈夫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有技巧地引导丈夫和母亲注意到对方对自己的关心和体贴,投其所好的表达对对方的善意与关爱,使双方能够有效地良性互动,产生出感激、信任等情感,建立起良好的情感互动。

(三)关键中间人:亲子纽带和夫妻纽带

在受访的家庭中,中间人很多时候由年轻夫妇中与父母同住的一方扮演,通过亲子和夫妻纽带,协调父母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中间人是否能够有效地发挥调节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的特质。合格的中间人往往夫妻关系良好,双方维持着日常事务上的交流,了解对方的需求和想法,传递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共识的达成不见得一定是观念一致,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爱的表达”。比如,岚珊的丈夫在协调妻子和母亲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他如此描述和妻子的关系:“我和老婆不怎么吵架,我说不过她,一般都是她对。”在晓旭家,晓旭能够提醒丈夫不回家吃饭要提前打招呼,成功敦促丈夫“主动”接丈母娘回来,都建立在良好的夫妻关系的基础上。

中间人与父母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中间人与老人保持良好的情感关系,得到老人的信任。比如晓旭和母亲虽然时不时拌个嘴,但在晓旭与母亲的良好关系使她确信“亲母女不会真有芥蒂”“拌嘴都不会放到心上”。这种亲母女的感觉很大程度是通过日常生活相互关心和照顾沉淀下来的。比如,晓旭给妈妈生活费,逢年过节也给妈妈一两千;爸爸住院动手术,晓旭主动出了5万块,老人很高兴。晓旭还经常给妈妈买衣服,妈妈虽然嘴上说不要,但心里挺美。

另一方面,作为中间人的子女在与老人的关系中往往也有一定的主导性和权威性,这在岚珊丈夫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岚珊丈夫明确认定夫妻轴的核心地位,母亲就是来帮忙带孩子,他心存感激,但家里的事情老人不该掺和。他表示:“我妈就是一农村老太太,啥也不懂……一般有什么事不会找老人协商,因为跟老人没关系啊!我妈就是个执行者,跟我们意见不一致时一般都是听我们的。”与此同时,他定期给母亲钱、带母亲看病、给亲戚办事,让母亲“脸上有光”,是个“孝顺”“靠得住”的儿子。在母亲眼里,儿子上了大学,在国家单位工作,有出息、有文化、又关心她,因此她“特别地听儿子的话”。

如上所述,中间人高度依赖于亲子和夫妻的情感纽带。扮演中间人的家庭成员需要与配偶保持情感亲密和有效沟通;在与父母的相处中,兼具“孝顺”与“权威”。当这些条件缺乏时,一些在家庭关系中处于中间位置的成员在父母和配偶双方发生矛盾时,不能起到调节家庭矛盾的作用,甚至可能激化冲突。琳之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琳之,33岁,硕士毕业,在事业单位工作,月入过万,丈夫和她学历相当,是公务员。琳之公婆老家在河北农村,不时过来小住几天,大家相处得不错。琳之怀孕后,公婆为了照顾她就搬过来,住在他们楼上。琳之觉得每天回家有饭吃,有人照顾,很幸福。

一天晚上,夫妻俩因小事起口角,越吵越凶。第二天,两人到楼上公婆处吃饭。婆婆说:“我一直以为你们俩很好,原来都是在我们面前装出来的,昨天晚上你们吵架,我一晚上都没睡着,你们为什么吵架,说来听听?”琳之丈夫不说话,琳之觉得自己和公婆关系好,就列举了对丈夫的种种不满。婆婆听完说:“我觉得你说的也对,你觉得他这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还要在一起呢?孩子生下来你要也行,不要就我给你带着也行。”琳之很生气,双方话赶话吵了起来,夫妻口角转变成婆媳冲突。琳之丈夫一言不发,婆媳俩逼问他什么态度,他回了一句:“理智上来说离婚也行,但不是还有感情吗?”

第二天,琳之虽然还跟丈夫一起还去公婆家吃饭,但感觉很别扭。吃完饭,丈夫没有挪窝的意思,琳之就叫他一起下楼。婆婆很不乐意,双方又有些言语交锋。面对婆媳俩的争吵,琳之丈夫很头疼,第二天以加班为由不回家。琳之闻讯后跑去丈夫单位两人一起住单位。觉得在家里太压抑,琳之周末又拉着丈夫开车去郊区散心。回来后,公公婆婆很不开心,质问他们:“你们俩还知道家里还有两个人啊?”新一轮的矛盾又爆发。丈夫责备琳之:“你为什么也不提醒我给爸妈打个电话?”琳之感到很无奈。之后婆媳间磕磕碰碰不断,矛盾无法缓解反而升级。最后,经琳之父亲与公婆商谈,公婆回了老家。

琳之与公婆的矛盾与岚珊家相似,都围绕跨代同住的家庭“边界”,公婆“干涉”了琳之认为的“夫妻俩”的事儿。然而,与岚珊丈夫介入疏导不同,原本处于中间人位置的琳之丈夫在矛盾发生时未能及时“冷却”止损,在矛盾发生之后没能进行必要的沟通缓解,相反一直处于“逃避”的状态,激化了矛盾。

这很大程度上与琳之丈夫与父母及妻子的关系有关。在琳之公婆眼里,儿子从小到大学习好、工作好,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对琳之的好,是对儿子的爱的延伸。听到琳之夫妇吵架,儿媳又列举了儿子种种不是后,他们对儿媳的情感投射大大减弱了,转而试图更加强化与儿子的亲子纽带。而琳之认为自己怀着孕,与公婆关系紧张后,更希望得到丈夫的疼爱和关心。琳之丈夫在与父母的关系中,缺乏沟通渠道和足够的权威性;在与妻子的关系中,也一度处于口角后的“赌气”状态,处于中间人位置的他无力应对双方的期待,反而选择抽身事外,逃避矛盾,加剧了家庭矛盾的恶化。

四、形式民主化

在之前讨论的案例中,代际关系处于相对平稳乃至和谐的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老人甘居“帮手”位置——操办家务,但退出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从而避免了大量的意见分歧和家庭矛盾。然而,在一些家庭里,家庭决策更多呈现出更多的协商过程,老人对家庭事务以及其他成员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并在决策中享有一定的发言权。尽管年轻夫妇通常在商议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但相互沟通、协商的民主形式往往让老人感受到更多的尊重,对家庭关系更为满意。洋帆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洋帆,32岁,大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在公司工作,年收入十万左右,丈夫从事投资行业,两人在北京贷款买了房。女儿五年前出生,从那时起,婆婆搬来一起住,帮忙照顾孩子,一年前公公也搬来同住。公婆六十多,老家在农村,没有退休金和医保。三代同住,大家磨合了一段,各自都做出些调整,之后渐入佳境。洋帆认为自己的处境就是“理想的家庭关系”,而老人也对当下的生活“感觉很好”,表示儿子儿媳“很尊重自己。”

洋帆夫妇负担了老人所有的开销,并定期给老人零花钱。平时丈夫工作忙,洋帆主动关心了解老人的需要,帮老人购买常用药品,不定期为老人添置衣物和营养品。夫妇俩平时经常主动跟老人聊天,跟他们谈谈自己的工作,“高兴的烦心的都会说一说”。家里的大事,比如调动工作、孩子上幼儿园等,他们也会找老人一起商量。比如,两年前,洋帆丈夫想从体制内转行做风投,跟家里商量,老人觉得稳定的工作挺好,但是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出去闯一闯也挺好的,表示支持他的决定。在访谈中,洋帆公公自豪地提到儿媳妇换工作的情况:当时洋帆的单位要搬迁到外地,洋帆想换工作,因为表现出色,她很快被原单位楼下的另一家公司的录用。

在洋帆看来,公婆虽然教育水平和见识都不如自己,但他们希望得到被需要的感觉,所以她尽量多跟老人讲讲自己的事儿,让老人发表意见,其实老人基本都支持他们的决定。洋帆说:“父母对子女都是无条件地付出,作为子女应常怀感恩之心,不管从经济,还是感情上,都要让父母感到舒服,有幸福感。”

与其他受访家庭相比,在洋帆家,老人对子女的情况更为了解,在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中也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从家庭决策的结果来说,洋帆夫妇的意见显然更为重要。但是决策过程的协商形式使得老人获得了参与家庭重大事务决策的资格。正如吴飞指出,家庭政治的基本原则正是围绕家庭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至少得到更大的尊重(吴飞,2009)。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尽管老人获得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而非实质性的),但这种“形式民主”具有一种符号价值,让老人感受到更多的理解、尊重和自我价值,也为子女获得更多的“道德认可”,缓解了家庭政治的张力,促进了代际关系和谐。^①

五、小 结

本文通过对家庭案例的分析,重点论述了跨代同住情境中代际关系的三种协调机制:情感缓冲、中间人调节和形式民主化。情感缓冲和中间人调节是很多家庭协调代际关系的常见机制。信任、关心等亲密情感通过日常事务的合作、道德责任的履行和情绪上的体恤而日积月累,从而在发生分歧和摩擦时一方或双方愿意采取包容性应对,避免矛盾激化。在家庭成员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观念分歧和情绪紧张时,导致部分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难以建立或维系的情况下,中间人的有效调节则变得至关重要。这两种机制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情感。形式民主化则更关乎权力平衡,主要体现在家庭决策的民主参与。然而,在受访家庭中,大部分老人基本退出重大事务的决策,因而形式民主化在很多家庭里不太凸显,这也有待于后续研究进一步考察。从目前受访家庭案例来看,形式民主化机制在代际关系良好的家庭中更容易建立和运作,权力平衡反过来也有助于代际情感互动。

^① 需要指出的是,从访谈的案例来看,形式民主化的顺利运作往往是建立在年轻夫妇在决策中的实质性权力不被颠覆的基础之上。如果老人和年轻夫妇在重大家庭事务上意见严重分歧,那么协商很可能演变成争论和冲突。

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体现出文化韧性和内在张力的双重性。韧性体现在代际责任伦理依然对家庭生活中的个体具有约束力,构成了代际互助合作的基础;而张力则体现在亲子间的价值分化,亲代权威的实现越发倚重于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内化(刘汶蓉,2016)。本文研究的跨代同住家庭也体现出代际互助中的责任伦理、价值分化和情感调和之间的交织关系。在这些家庭中,成年子女与其父母仍将相互照顾、扶持和帮助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子女一方体现为对老人经济和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关心,在父母一方则体现为协助照顾孙辈,并力所能及地给予经济支持。这构成了跨代同住家庭的伦理基础。在应对代际间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之争时,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成为协调代际关系的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案例中,老人总体上呈现出放权的趋势,年轻夫妇处于更权威的位置,一定程度上与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及跨代同住是以年轻夫妇为中心的家庭扩展有关。受到研究样本的局限,本研究未能充分讨论其他类型的家庭情况。那么,“子强父弱”的家庭格局是否构成了本文所分析的三种代际关系协调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家庭)条件?在其他的家庭权力结构下,代际关系协调是否存在新的挑战和新的机制?这些问题尚待日后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以便深入探讨家庭代际协调机制及其发生作用的家庭与社会条件。

参考文献:

- 刘岚、雷蕾、陈功,2014,《北京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趋势》,《北京社会科学》第5期。
- 刘汶蓉,2012,《反馈模式的延续与变迁》,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16,《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栾俐云,2009,《变迁中的中国家庭与儿童看护的社会学考察》,《湖北社会科学》第8期。
-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2011,《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沈奕斐,2013,《个体家庭: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石金群,2016,《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机制、逻辑与张力》,《社会学研究》第6期。
- 石翎,2012,《隔代照顾下扩展家庭的冲突与和谐分析》,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跃生,2012,《城乡养老中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以2010年七省区调查数据为基础》,《开放时代》第2期。
- ,2013,《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2014,《中国城乡老人居住的家庭类型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吴飞,2009,《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夏天,2015,《照料孙子女的选择背后:北京市老年人的个案研究》,《家庭与性别评论》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肖索未,2014,《“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社会学研究》第6期。
- 许琪,2013,《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社会》第3期。
- 姚俊,2012,《“临时主干家庭”: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动与策略化——基于N市个案资料的分析》,《青年研究》第3期。
- 张爱华,2015,《农村中年女性的温情策略与家庭关系期待——对河北上村隔代照顾实践的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钟晓慧、何式凝,2014,《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开放时代》第1期。
- 周怡,1994,《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左际平、蒋永萍,2010,《社会转型中城镇妇女的工作与家庭》,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 Evans, H. 2010. “The Gender of Communication: Changing Expectation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04(December).
- Gazso, A. & S. McDaniel, 2015, “Families by Choice and the Management of Low Income through Social Suppor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6(3).

Goh, E. & L. Kuczynski, 2010. “‘Only Children’ and Their Coalition of Parents: Considering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as Joint Caregivers in Urban Xiame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4).

——. 2012. “‘She Is Too Young for These Chores’——Is Housework Taking a Back Seat in Urban Chinese Childhood?” *Children & Society* 28(4).

Emotional Buffering, Middle-person Mediation and Formalized Democracy: Mechanisms of Intergenerational Coordination In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XIAO Suo-wei; GUAN Co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flicts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young couples and their co-residing parents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ten families. It finds that disagreements and dispute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existed in all families. Most families managed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across generations via three main mechanisms: emotional buffering, middle-personal mediation, and formalized democracy. Emotional buffering refers to the ways in which disputes and conflicts are ameliorated by affective relation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When emotional ties between particular members break or are yet to be established, the middle-person mediates to help build goo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or resolve the disputes and conflicts. Formalized democracy also works in families where family members obtain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from others by democratize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family affairs.

Key words: Multigenerational Co-residing Familie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Coordina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黄盈盈)